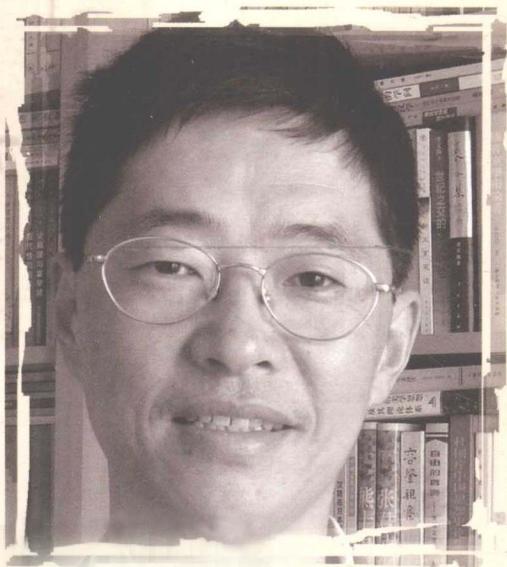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编 徐俊西 王纪人

文学的凝视

杨扬 著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编 徐俊西 王纪人

文学的凝视

杨扬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凝视/杨扬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53-1

I . ①文… II . ①杨… III .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41 号

责任编辑 : 徐华龙

封面设计 : 周志武

文学的凝视

杨 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296,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53-1/I · 3203 定价: 3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 15 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

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第一辑

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

——对一个文学史问题的回答 3

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与文学 19

幽暗时光隧道里的二十四年记忆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年)·史料索引卷》序言

..... 51

第二辑

被动摇的文学基石

——新世纪文学随想 69

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新变化

——2009年5月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 82

性别与文学的关系

——以新世纪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为参照 91

话语生产

——四种当代文学批评的情景对话 107

文学“正义”与新世纪文学的流变 121

第三辑

从最简单的事说起

——评储福金的长篇小说《黑白》 137

张旻和上海小说	
——由长篇小说《邓局长》想到的	140
无声的舞者	
——关于滕肖澜的小说	142
关于薛舒的长篇小说	147
一种叙述,两种经验	
——由宋耀良教授的长篇小说《人面岩画之谜》想到的	150
江南文学絮语	
——关于叶兆言的小说	152
“60年代生”及对应的文学气质	
——毕飞宇论	156
穿心苦莲与都市之心	
——读潘向黎长篇小说《穿心莲》	167
松沪线上的文学风景	
——《印象:王勉散文选》读后	180
赋予爱以激情体验的写作	
——读贝拉的作品	183

第四辑

读一部关于上海的研究论著	
——陈惠芬《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读后	189
学问家的众生相	
——读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	193
在那望得见海的地方写书	
——陈国球先生《情迷家国》读后	197
鸿飞那复计东西?	
——读《林同奇文集》	202
与燕卜荪有关的几本书	205

那是漂泊者在倾诉

- 由韩素音的自传作品《瑰宝》所想到的 209
 梅光迪先生与他的书 212
 David 和他的书
 ——王德威教授《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读后 215

第五辑

杂忆与杂想

- 关于钱谷融先生 221
 一个人和一些事
 ——李子云老师与 1990 年代以来的上海文学 227

第六辑

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

-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理解 237
 文化空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特色 252
 影响“海派文学”的几个因素
 ——上海经验的文学史表述 267
 都市社会与五四运动
 ——以民初商务印书馆的知识群体为例 290
 南移与北归
 ——从文学视角看城市文化的变迁 295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2009 年 7 月 1 日在上海大学本部的演讲 305

第七辑

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白璧德

- 2010 年 3 月在哈佛大学“全球化与人文主义”国际研讨会
 上的讲演 319

哈佛所见 Fong F. Sec 材料	333
哈佛所见白璧德文档中与中国学人相关的几个文件	338
哈佛所见吴宓致白璧德的英文书信	341
哈佛所见霍金文档中与中国学人相关的几条材料	345
陈寅恪先生不曾入集的三封信	350
编后记	361

第一辑

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

——对一个文学史问题的回答

概念有助于廓清思想吗？我看未必。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看，概念越多，思想越模糊；争议越多，评价尺度越具弹性。不是吗？1950年代起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业绩还没有多少，概念上却非常鲜明地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断裂开来。“当代文学”以其着眼于当下进行时态的文学，而与过去的“现代文学”形成了对照。在19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具有同等性。其时段性、政治性和区域性所指，极其明确，主要指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范围内具有社会主义价值特征的新文学。198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尽管延续着“当代文学”的命名，时段上却已悄悄做了修正。所谓“当代”，已不再着眼于当下，而是有了三十年岁月沧桑。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又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除了加重文学史材料的叙述，文学类型和活动空间也在扩大。武侠小说、通俗文学、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加入，使得1950年代打造的中国“当代文学”概念很难继续1949年至今的时段来限定，更难以用“社会主义文学”来命名。面对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学”的可能的命名与阐释，人们会觉得“当代文学”一词，只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它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相比，缺乏起码的明确性。

要给“当代文学”确立一种标准，给予一个明确的定义是相当

困难的。这就像是在用一种凝固的尺度丈量不断成长之中的事物一样。事物本身在不断变化,而尺度假如不变,再精心尺量,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不是非要给出一种界定不可,它可以有别的理解。英国当代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论及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时曾表达过如下的思想:任何想要给浪漫主义确立定义的做法,都应该小心,人们不是在这里出了错,就是在那里漏掉了重要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在用浪漫主义命名的历史时段中感受和体会浪漫主义所拥有的东西。^① 伯林的研究思路对我们研究“当代文学”或许有一些启发。假如我们不是要给“当代文学”以一种明确的界定和命名,或者以今天的理解来苛求“当代文学”具备当时难以具备的诸多因素,那么,我们不妨从“当代文学”所命名的这段文学史时段中,体会某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特征,以便揭示影响“当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因素和主导模式,思考与“当代文学”相关的诸多关系。

二

在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概念时,绝大多数学者都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代表着改朝换代之后新中国文学正统论的主体意识。^② 依据这样的标准来考察 1950 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所谓的港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自然都不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这倒不是说港台和海外华文作家这一时期没有创作,或当时中国大陆完全不知道港台和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而是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视野看,这些港台和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当代”价值观念之外的创作,代

^① 参见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第 26—27 页,译林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② 参见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 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体应该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这种思想意识在当时表现得非常强烈。1950年代初，胡风在长诗《时间开始了》中，将旧政权以及过往的生活宣布为过去，将新中国诞生视为一种新的时间的开始。这种着眼于当下和未来的文学畅想，在很多人心目中确立起一种改朝换代后的“当代文学”概念。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调整着自己的笔墨，意识到不能像描写旧社会那样来描写新中国。至于新中国的新文学应该如何来表达，绝大多数1949年过来的“现代”作家心中是没有底的，他们尝试着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新社会，像沈从文、郭沫若、老舍、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放弃了原有的刻画世界方式，以一种重新学习的姿态来体会新中国新社会的新生活。譬如，对新中国新社会几乎一律采取讴歌的方式加以赞美。这种简单明快的文学歌唱，使得“当代文学”呈现出很少涉及“现代文学”乃至传统文学中那些缠绵悱恻、委婉复杂的情感现象。^① 初生的“当代文学”似乎着意于确立的，不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中强化的拷问灵魂或批判“国民性”的传统，而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和作家个人情感、立场的“正确性”。文学道德伦理的骤然强化，使得作家、批评家在关注和思考“当代文学”创作时，不是着意于从个人出发，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体会来把握社会生活，而是倾向于领会时代精神的要义，从新政权的政策、法规、社会导向出发来选取作家、评论家个人的创作。大凡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几乎没有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批判现实的精神气魄。少数触及社会现实矛盾题材的作品，像《我们夫妇之间》、《红豆》、

^① 丁玲在1950年8月25日《文艺报》上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一文，她认为“中国的文艺，不正是抛弃了那个徘徊惆怅于个人情感的小圈子么？抛弃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孤独绝望，一些少爷小姐，莫名其妙的，因恋爱不自由而起的对家庭的不满与烦闷么？”，在她看来，“现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个人情怀恰恰是“当代文学”所要克服的。参见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第18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锻炼锻炼”》等,只是以极其委婉的笔墨,吞吞吐吐地述说着生活中遭遇到的一些不合常理的小事、琐事和烦心事,其立意和用心,无非是希望国家方针、政策,能够顺乎民意、关注民生。但这样的作品和情感处理方式,在“当代文学”中不只是微弱的一角,而且,作品发表后大多遭遇批评非议的待遇。因为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主流是歌颂新生活,任务是确立与这种新生活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文学新形象。像《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党费》中的老妈妈,《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我”,《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田副局长等,全然是新中国文学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学青苗。他们与过去的“现代文学”中的形象对比,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这就是“当代文学”中的人物,基本上体现出集体生活条件下人的精神风貌,即便是反映 1949 年前的个别人的个人生活,也是某种集体经验的高度浓缩。譬如《党费》中的老妈妈形象,没有人会把她当作一个个别的农村妇女,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从这位老妈妈身上体会到一种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类普遍存在于“当代文学”中的创作特色,用当时较为流行的理论来概括,就是文学创作应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其中“典型”一词的含义,在这里更倾向于集体经验的提炼和浓缩。“当代文学”弱化的是作家个体声音,突现的是社会时代的集体合唱。那些“当代文学”中轰动一时的名篇佳作,很多题材和人物处理,都与政治宣传或明或暗地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所具有的直接对应关系,是“现代文学”中少有的。^①如果说,“现代文学”大都是呈现写作者个体对自我、对社会的“我”的感受的话,那么,“当代文学”较多地体现出写作者

^① 沈从文在 1950 年代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时写的思想汇报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时代已将社会重造,人和人关系重造,——即在文学方面,过去孤帆独征的探寻工作方式,也起始在文艺座谈共同纲领对于文学艺术所提示原则上,对于年轻一代工作给以各种鼓励和方便。集体生产用在小说方面虽还待商讨,用到戏剧电影舞蹈音乐方面,所作的实验都有了成就。且无疑还有更多样伟大成就在发展中生长。”参见《沈从文全集》,第 27 卷,第 95 页,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代表“人民”、“社会”等群体在述说和表达。“当代文学”不满足于一般的文学层面的叙述和抒情,而是要跑到现实生活之前,站在时代的前列,宣传、鼓劲,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创作要高于生活。

在关注“当代文学”时,有一个表明当时作家身份的词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文学工作者”。作家已不是普通的文学写作者,而是肩负着宣传社会主义文艺重任的宣传者。与这种身份相关的,是作家队伍的体制化。在“现代文学”中,作家大都为个体劳动者,游离于组织之外。但“当代文学”中,作家大都是组织中人,没有组织关系的作家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寄生在组织系统之中,作家、评论家个人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关系,逐渐从原来依靠社会转而依赖于组织。不仅稿费制度在“当代文学”中渐渐淡出,作家们像国家机关干部一样有行政级别、拿不同工资,而且,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等具体的文学问题也进入到组织管理程序。国家体制的高度强化,使得原本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空间渐渐消失。如果问,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普遍呈现的写作特色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反映社会集体生活状态的作品比较多,而五四时期那种倡导个人本位的“人的文学”比较少。造就这种注重集体生活经验的“当代文学”的直接原因,与国家对于写作者的高效管理有关。

处于国家组织系统之中的“当代文学”与个人写作为主的“现代文学”,其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有着天壤差异。前者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家文学,后者只是代表作者个人爱好的个体文学。在“当代文学”行列中,写作者的文学表述总是与国家形象的变化结合在一起。那些流传至今的1950、196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老不长进的老中国的老儿女们的缓慢生活相比,题材上的确有着鲜明的时代感。1950年代的生活状态,绝不可能带进1960年代。以农村生活题材为例,当1950年代的农民正在为是否参加互助组、合作社而烦恼时,1960年代的人民公社已经宣布合作化运动成为过去。如此快速的政策变化,造就了“当代文学”若要

反映现实,就必须随同政策、法规与时俱进,否则,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细节、背景描写便会差错连连。所以,对很多不熟悉这些政策变化的当代作家,当他放弃对个人情感的描写转而表现当代题材时,确实面临着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就如沈从文 1950 年代创作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作者希望通过描写一个地主的后代怎样在新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故事,来歌颂新中国。但沈从文一落笔就遇到很多现实问题。排除具体的文学写作技巧不谈,单从故事细节考虑,沈从文必须了解新中国地方政府对于地主子女的改造是如何进行的;遭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农村的政策、法规前后又有怎样的变化、调整等。如果这一切都不了解,只是简单地讲一个改造地主子女的故事,这种缺乏具体生活现场感的文学叙述,再怎么立意,总难以生动起来。当一些作家整天忙着调整自己,以便让自己适应于不太熟悉的社会生活时,要求他们创作出成熟的文学作品,大概是一种奢望。如果我们考察一下 1950 年代那些从“现代文学”过渡到“当代文学”世界中的作家,会注意到其思想和创作状态,大都处于一种调整之中。所以,与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学”热烈憧憬的美好愿望相对照的,是“当代文学”并没有贡献出多少成熟的作品。这是“当代文学”草创期的尴尬。

三

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辉煌的时期。不仅以各种文学史面目登场的“当代文学”教程进入了大学讲堂,而且“当代文学”在社会上受人瞩目的程度,超乎寻常。如话剧《于无声处》短时间在全国上演一千多场。如《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作品,因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特权”问题,而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其他像文艺理论领域对“现代派”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都在 1980 年代的社会生活中引发巨大的反响。“当代文学”的这种高度敏感性和社会轰动效应,大大提高了全民对